

前 言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上，北京城以其特有的地位而独领风骚。封建社会后期数朝历代帝王的治国安邦，精心经营，使古都北京长期居于文化中心地位，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地。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有具形的物质文化，又有抽象的精神文化。揭示北京的古文化，古代建筑是不可多得的视点。它们不仅以自身的形体展露着具形文化丰富的信息，而且蕴含着意象文化深厚的内涵。

北京现存的古建筑琳琅满目，其中有一类性质特殊而地位重要，这就是遍布古城内外的大小祭坛和神庙。

说起北京的坛庙，人们并不陌生。在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的片头画面中，总会叠现出天坛祈年殿的瑰丽身影，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我国著名作家秦牧就曾写下这样脍炙人口的话语：

“北京的南郊有一座天坛。

知道天坛的人是很不少的，在天安门城楼未曾闻名世界以前，它曾经是旧时代北京的标志。从前，在日历牌上，名胜挂图上，纸币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图形。一个圆形的大建筑物，富丽典雅，逐层向上收缩，给人一种庄严大方的

印象。

整个天坛区域现在成为天坛公园。这里，古老的松树很多，树木蓊翳，是一个幽静的去处。……望着那些阅尽兴亡、饱历劫难的苍松翠柏，别有一番滋味。”

天坛，以其恢弘的气势和独具特色的建筑而蜚声中外。除了天坛，北京昔日的著名坛庙还有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先农坛、太庙、孔庙、历代帝王庙……

历史上，北京的坛庙大多是戒备森严的皇家禁地。然而时移境迁，随着封建王朝的消亡，这些形形色色的坛庙一朝卸却昔日的神秘和尊严，或辟为公园，或以文物古迹的形式供人们消闲、游览和凭吊。

逛过北京坛庙公园的人不在少数，在前几年北京十大旅游景点评选中，天坛公园仅次于天安门和长城而位居第三。其他如地坛的春节庙会，中山公园昔日社稷坛的五色土等，也无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当徜徉于这些坛庙公园中，你是否想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是否想了解它们的文化内涵呢？

现在就让我们循着这两个话题，一同走进北京坛庙的悠悠历史中去。

一、敬天法祖与坛庙文化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坛庙建设始终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北京的坛庙无疑是中国古代坛庙文化的一个缩影。因此，要谈北京的坛庙，离不开了解我国古代坛庙文化的大背景；反过来说，以北京坛庙为解剖点，将会加深对中国古代坛庙文化的整体认识和把握。

什么是坛庙？简单地说，坛和庙都是古人用来祭祀鬼神的场所。这二者虽然内涵一致，但形式上有所不同。

所谓坛，原来是指在平坦地面上以土石堆筑的高台。古人在盟誓、朝会或封拜时，也常常筑坛行事以示郑重。如秦朝末年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就曾筑坛聚会，礼拜韩信为大将。

坛在古代的用处不只一途，但其主要功能还是用来祭祀。有古代汉语词典之称的（说文解字）中，即将坛注解为“祭场”的意思，因此坛通常又被称为祭坛。

庙最初本指一种住宅。根据古文献记载，周代的各种住宅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帝王及诸侯所居之宅称之为寝，大夫以下官员的住处及前堂称之为庙，这样古人又把住宅统称为寝庙。很早的时候，人们将死去的祖先放置住处即寝庙内以行祭奠，后来有了专门祭祀先人的处所仍沿称为庙，并逐

渐固定为专有称呼。

坛和庙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前者是露天的平台，后者是封闭而有门户的屋宇，但坛庙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是仅就狭义的坛、庙而言的。从广义概念来讲，古代的坛庙除了主体建筑外，还往往有各种附属性建筑，尤其帝王祭坛和神庙，更以布局宏大、规模完整而著称。如北京的天坛，狭义的概念仅指位于今公园东南方的圜丘坛；广义的天坛则包括了斋宫、祈年殿、皇穹宇、宰牲亭等其他所有建筑物。

因此，广义的坛庙可以说是一组用以祭祀鬼神的建筑群。

坛和庙既然都是用来祭祀的场所，那么坛庙文化首先就是一种祭祀文化（其次还是一种建筑文化）

所谓祭祀，是指人们在特定场所，借助特定物品和形式，向特定对象表达情感和意愿的行为。这里的特定场所即指祭坛神庙等建筑；特定物品和形式，是指祭祀的礼仪和制度；特定对象，则是指被祭拜的各种鬼魂和神灵。

祭祀活动源自古老的神灵崇拜。

人类自降生以来，就与自然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但早期人类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诸如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经常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这些自然现象也刺激着人类思维的发展，尤其那些能引起人们依赖感的现象和变化，使人们觉得自然界是一个有人性、有意志的实体，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

万物有灵观念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自然界对人类

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愈益强大。像粮食生产的丰欠，牲畜长得好坏，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大自然是否风调雨顺。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形成了对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敬畏心理。认为它们具有神奇的能力，可以轻易地祸福人类。于是便把它们作为崇拜的对象加以礼遇，借以祈求它们的保护或降福，这就是古老的自然神信仰和自然崇拜。

人类在崇拜自然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种崇拜，即对自身或人鬼的崇拜。

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人类对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逐步深入认识，但对自身的一些生理和心理现象却常感困惑。例如生老病死、梦境幻觉，种种谜团使人们想象人体中有着某种神秘的存在，它控制着人的思想和感觉。这种神秘的存在，被称之为灵魂。

在古人看来，人死而灵魂不灭，死人的灵魂不仅仍需活人关照，与此同时，也在另一个世界里默默关注着活人的生活，既可作祟致祸，也能赐福降祥。对于前者，人们充满恐惧之心；对于后者，人们满怀崇敬之情。为此，他们采取祭奠和丧葬等仪式来博得鬼魂的好感，这就是原始人鬼信仰和崇拜。

自然崇拜和人神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的共有现象，但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和水平有所差异，不同民族所崇拜的对象不尽相同。华夏民族在长期的融和发展中，形成了一群特有的神灵，而且在此后数千年历史上，积淀了博大精深的祭祀文化。

要谈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恐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

楚，这里仅就几个方面大致做一提示，以有助于我们对坛庙文化的整体理解。

首先，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祭祀文化起源很早。80年代初在辽宁凌源县发现的远古时代的坛、庙、冢遗址就是证明。夏商时期进一步充实、成熟，到西周时期基本定型。此后经过孔子等先秦儒家的整合与推演，秦汉以后不断发展且愈演愈烈，到明清时期则蔚为大观。

其次，从社会波及面来看，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几乎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上到宫廷和官府，下到士族和百姓，无不参与其中。对民间祭祀来说，在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等方面，表现出驳杂不纯的特点。虽然其中不乏庄严与神秘，但往往又与热烈的气氛和喧闹的场面相伴随，使得祭祀活动于庄严神秘中平添出许多生动和趣味。但宫廷和官府的祭祀，则大不一样，不仅场面隆重宏大，气氛庄严肃穆，而且有着一整套繁缛复杂的礼仪制度。

再者，从祭祀对象的范围来看，既包罗万象，又有所侧重，其中以敬天法祖，成为中国古代祭祀文化的主旋律。

根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中国古代受祭的众神谱大致分三类：一类是天神，包括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一类是地祇，包括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等；一类是人鬼，包括氏族祖先、民族祖先、杰出人物等。

在天神系列中，昊天上帝是最重要的神灵。昊天上帝通常又被称为天帝或上帝，它是古人想象中总管天地万物的至上神。除了天帝，天神中比较重要的还有日神和月神。星辰之神又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天文历法方面的意义而受祀

诸神，如二十八宿、北斗、参商及岁星神等。一类是星相学家所附会的恒星天官神和五星神。前者包括被附会为昊天上帝北辰和被附会为五帝的五帝座，此外又有风师、雨师、司中、司命、司禄、司民、灵星及寿星等；后者指五大行星，即火星荧惑、木星岁星、金星太白、水星辰星和土星镇星等。

地祇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神。土地神有两类，一类是代表大地众土的“地”神，是与天帝相对应的“地母神”；一类是代表领土土地的“社”神，社神通常又与代表五谷的稷神合称为“社稷”。除了地母神和社稷神，地祇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山川神。山川神也有两种，一是一般性的山林川泽，属于小神；一是地位较高的名山大川。在古代，所谓的名山大川指的是“五岳四渎”，即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等五大高山，和黄河、淮河、长江和古济水四大河流。次于五岳的，还有五镇，即东镇沂山，中镇霍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

人鬼中最重要的是祖先。祖先既包括氏族祖先，如始祖、远祖和近祖；也包括民族祖先如三皇五帝、历代帝王等。除此之外，一些有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以及其他受爱戴的英雄也往往被奉为祭祀的对象。

神灵众多、包罗万象，是中国古代祭祀文化的显著特征，但富有民族、宗教、家庭凝聚力的祖宗崇拜，至高无上的皇天上帝崇拜，和象征国家及地母的后土社稷崇拜，在鬼神世界中成为鼎足而立的三大“权威”。这三大“权威”的进一步表现便是中国古代祭祀文化中的“敬天法祖”思想。

敬天法祖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祭祀

文化的强烈现实功利性。

我国的祭祀文化形成于夏商时期，而夏商时期正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王权政治的建立，使我国古代祭祀文化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

简单地说，中国的祭祀文化从其初成起即有别于史前简朴的祭祀礼仪，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成为维护王权统治的有力工具。这种现实功利性，到西周祭祀文化的定型期表现得尤为显明。

西周时期，社会格局以周王号令诸侯进而统治天下为特色。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周王继承并发展了殷商时期所形成的“天帝”观念，自奉为上天之子即“天子”，这样，周王成为上帝和天的人格体现，通过尊天敬德思想的强调，神化自己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周代实行宗法制度，周天子被奉为天下大宗，周天子通过尊祖敬宗，又可以极大地强化周天子的地位，达到其家天下的目的。

纵观周代的祭祀文化，统治者有意将祭祀礼仪制度纳入王权政治的体系当中，把祭祀天地鬼神视为统治权力的一种，使周天子和各级诸侯成为天神地祇人鬼的主祭人。而不同等级的人士，在祭祀对象、祭祀规格等方面都有着具体而明确的限制。

对周天子来说，虽然天地神祇祭祀名目繁多，礼祀隆重，但最重要、最频繁、最复杂的莫过于祭天和祭祖。

以敬天法祖为灵魂的祭祀制度，到东周以后，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不断下降及诸侯、卿大夫地位的不断上升，逐渐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但随着春秋后期君主专制制度的日益强化和发展，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重建秩序的热

潮，在此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恢复周礼古制的旗帜下，对古老的祭祀礼仪进行了整合捏塑。

大致说来，经过先秦儒家整合捏塑的祭祀制度更加强化了维护现实生活的政治、宗法秩序的功能。换言之，所有与维护社会秩序有关的伦理义蕴、道德价值、政治原则，统统都被揉进这一古老的祭祀礼仪之中。而且，儒家的另一作用，就是把祭祀的目的，从以悦天地鬼神为主，完全转变为以治人济世为主，从而使祭礼成为融政治性、伦理性、功利性于一体的教化之本。

正是由于儒家的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很好地适应了最高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基本需要，所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它们便成为历朝官方和帝王大肆张扬、乐此不疲的统治法宝。虽然各代在具体规定上互有不同并不断衍化变革，但都是以儒家的祭祀观念和礼仪为指导，上慕周礼，下求完善，强调通过对天地神祇及祖先或其他人物的祭祀，借以表现皇权的神圣与崇高，从而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古代的礼义，有“吉、嘉、宾、军、凶”五礼之分，其中五礼之冠的吉礼，便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古代的祭礼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极为博大精深，一部二十四史中，对各朝各代繁复复杂的礼仪制度皆有详备的记载。概括说来，即在祭祀的等级规模、祭祀的供品、祭祀的时间、祭祀的程序，以及与祭祀有关的仪仗、乐舞等方面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

但一切祭祀活动都离不开凭借一个特定的场所。

早期的自然神祭祀并没有固定的场所，只要感到有此需要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祭献。而对于祖先等人鬼的祭祀，起初也多是在墓地或就在其旧日所居的房屋内进行。当祭祀制度产生，即宗法统治建立，特别是国家制度确立后，祭祀成为统治者借以表现尊崇、炫耀权力、震慑臣民的工具时，专门供祭祀之用的建筑和场所也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祭坛和神庙。

见诸史籍记载的我国最早的祭祀建筑是华夏初祖黄帝建造的明堂。《路史后纪》中载：“黄帝建合宫、奎殿，以祀上帝。”这里的合宫即明堂，明代杨一清考证说：“明堂之制，始于皇帝，祀上帝于明堂。”自黄帝以降，作为上帝神殿的明堂为历代所崇，所谓“君子将营室，崇庙为先”。到了西周时期，逐步形成了“左祖右社”、“兆五帝于四郊”的坛庙营建制度，并为其后历朝仿效和推崇。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数的祭坛和神庙，当然其中大型坛庙的建筑和使用无一例外地被统治者的帝王所垄断。与此相对应，坛庙也成为中国古代国都的代表性建筑。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包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六大古都在内，中国历史上有过十几座坛庙群，然而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曾辉煌一时的坛庙建筑，都已在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北京城内还完好地保存着中国古代最为精美最为完整的一座帝都坛庙群，能够使我们借以翻开中国古代坛庙文化的精彩一页。

二、北京坛庙溯源

今日所见北京的坛庙，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遗物，但北京有坛庙建筑却早在明清以前很久便开始了。

北京有坛庙建筑，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当时，今北京这个地方出现了周武王封立的诸侯国。《史记·周本纪》中载“武王追思先圣王 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礼记·乐记》中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且不论封于蓟的到底是黄帝之后还是帝尧之后，反正蓟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诸侯国，并以蓟城为国都。蓟城位于北京旧城区的西南隅，大致在今广安门一带。关于蓟城的城市布局和建筑情况俱已无考，但按照周礼，有“郊止天子 社止诸侯”“有国者事五世”的规定，也就是说，凡诸侯封国，皆要奉祖祭社。蓟城既然是西周初年的蓟国之都，应当也要遵循周礼的规定而建社坛、祖庙之类的建筑。

关于这一点，《墨子》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古汉语中，“祖”与“沮”通，结合《法苑珠林》中“燕之有沮泽，犹宋之桑林，国之大祀也”的记载，所谓燕之沮泽似乎应该是燕郊一处集郊祀与游猎于一体的处所，这样的处所大概是要

设坛筑庙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燕”是指燕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燕国封地原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之北的董家林、黄土坡一带。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已发掘出最初燕国都城遗址和一些燕侯墓葬，并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可以说，燕和蓟是西周初年同时封立在今北京地区的两个诸侯国。后来燕强蓟弱，燕国灭掉蓟国，并以蓟为燕国都城，蓟、燕古国的坛庙建设可视为北京城坛庙建设的先声。

但以上仅是推测。北京有文字记载的确切坛庙建筑出现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据《晋书·载记》：“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慕容）儁率军南伐石季龙，幽州刺史壬午弃城走，留其将王佗守蓟。儁攻陷其城，斩佗，因而都之。……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儁使范阳、燕郡构眊庙，以其护军平熙领将作大匠，监造二庙焉。”

东晋时期，今北京地区属幽州，州治即蓟城。前燕慕容氏曾一度以蓟为都，并建太庙。只是当时战火纷飞，领主频繁易，慕容眊所建太庙历时短暂。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不久契丹以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营建宫室，这其中包括辽景宗和辽圣宗的御容殿。所谓“御容殿”，即供奉先帝塑像或图像的地方，因此这两座御容殿相当于辽王朝建在南京的太庙。

公元1122年（宋宣和四年），金人联宋灭辽，攻占辽南京。29年后，即金天德三年（1151年）金主完颜亮欲迁都于燕，决定扩建燕京城，营造新宫室，改名中都。据《金图经》载：“迨亮徙燕，遂建巨阙于内城之南，千步廊之东，

曰太庙，标名衍庆宫。”这说明金朝建设中都时，即建起了中都的太庙。

关于金中都太庙的规模和形制史载不详，不过后来金人为蒙古军队所迫，弃中都而南迁汴京（今开封），并在汴京按中都规制重建太庙，《金史》中有汴京金太庙的详细记载，借此可见金中都太庙的布局和气派。

《金史》称辽太庙曰：

在宫南驰道之东，殿规：一屋四柱，限其北为神室，其前为通廊。东西二十六楹，为间二十有五，每间为一室，庙端各虚一间为夹室，中二十三间，为十一室，从西三间为一室，为始祖庙，祔德帝、安帝、献祖、昭祖、景祖祧主五。余皆两间为一室（或曰：惟第二、第三室两间，余止一间一室，总十有七间），世祖室祔肃宗。穆宗室祔康宗，余皆无祔，每室门一、窗一，门在左，窗在右，皆南向，右室之龕于各室之西壁，东向。其始祖龕六，南向者三，东向者一，其二、其三俱二龕，余皆一室一龕，总十八龕。……室之外通廊，殿阶二级，列陛三，前井亭二，外作重垣四缭，南东西皆有门，内垣之隅有楼，南门闾，余皆三。中垣之外东北，册室殿也。内垣之南曰大次，东南为神庖，庙门翼两庑，各二十有五楹，西南垣外，则庙署也，神门列戟各二十有四，植以木琦。

金中都太庙建于金天德四年（公元 1152 年）到金大定

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采纳廷臣之议，遵中国古制建四郊坛。据《金史·礼志》载，金中都四郊坛依次为：南郊坛圜丘，在丰宜门外，当阙之巳地；北郊坛方丘，在通玄门外，当阙之亥地；朝日坛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当阙之卯地；夕月坛夜明，在彰义门外之西北，当阙之酉地。

以太庙为首建，金人共在中都建坛庙十一座，它们各有方位，规则地分布在金中都都城内外，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坛庙建筑群。除上述太庙和四郊坛外，金中都内还建有社稷坛、风师坛、雷雨坛、武成王庙、孔庙，以及高禖坛等。

金中都坛庙建筑群是北京城历史上第一个较大型的帝都坛庙群，但金贞祐三年（1215年），金中都为蒙古军队攻陷，这座大型坛庙群也随其他宫室一道被焚，前后历时仅60余年。时至今日，北京城的南郊有个叫丰台的地方，有人说，此地原即为金中都南郊的拜天台。据清人吴长元所著《宸垣识略》载：“金中都郊天台在南城外 丰宜门者 金之南门 丰台疑即拜郊台 故曰丰台。”

金人创建了北京城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帝都坛庙建筑群。到了元代，第二个大型帝都坛庙群又相继出现。

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在这之前4年，即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在金中都之东北郊另建新都城。至元九年（1272年），新建都城命名为大都。

在元大都修建之前，即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年）三月“诏建太庙于燕京（故金中都）”。当大都城修建后，至元十四年（1277年）八月，“诏建太庙于大都”。元大都太庙建成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它位于皇城的东面，符

合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左祖右社”的基本模式。根据史籍记载，元大都太庙宏伟壮丽，“崇庸以环其外，东、西、南开棂星门三，门上驰道抵齐化门之通衢”。整个建筑群包括正殿、寝殿、宫门、角楼和庙垣等。庙垣外又有饗殿、齐班厅、省饗殿、初献室、雅乐库、法物库、仪鸾库、神厨等。

规模宏大的元大都太庙，于大德五年（1301年）遭火焚毁，至治二年（1322年）重建，制度仍如旧庙，但到明朝建立后被拆。

大都社稷坛位于皇城之西，南依大圣寿万安寺，北临金水河，有御道通往和义门内大街，建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为社坛、稷坛两坛制。据《元史·祭祀志》：

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诏岁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月，始用御史崔或言，于和义门内少南得地四十亩，为坛垣。近南为二坛，社坛东，稷坛西。社坛土用青、赤、白、黑四色，依方位筑之，中间实以常土，上以黄土覆之。稷坛如社坛之制，惟土不用五色。坛皆北向，二坛周围环以坛垣，砖为之，高五尺，广三十丈。四隅连饰，外垣棂星门二所，每所门三，列戟二十有四。

除上述结构布局外，大都社稷坛内还建有望祭堂、齐班厅、祠祭局、仪鸾库、法物库及牺牲所、神厨、井亭和执事房等，坛中并植松以为“社树”，规制恢宏，环境优美，与元太庙遥相呼应，蔚为壮观。

元大都的天坛名郊坛，建于城南丽正门外七里，当阙之

丙位。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

郊坛三成，以合奇阳之数；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上成纵广五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陛，陛十有二级。外设二壝，内壝去坛二十五步，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各四门。坛设于丙巳之地，以就阳位。外垣南棊星门三，东、西棊星门各一。中筑圜坛，周围上下俱护以壁。内壝、外壝各高五尺，壝四面各有门三，俱涂以赤。

元郊坛初建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为祭台。元贞元年（1295年）改建为祭坛。据史籍记载，蒙古人向有祭天习俗，只是礼仪较为原始而简单。宪宗时，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仕于蒙古，为蒙古制典章，建朝仪，规范官制，极受敬重。孔元措曾建议宪宗冕服祭天而被采纳，宪宗二年（1252年）蒙歌冕服祭天地于日月山。蒙古改元，忽必烈受尊号后，也曾遣官于大都城南设坛告祭天地。正是由于蒙古贵族受汉文化、特别是中原儒家礼仪的熏陶，元大都所建的郊坛在坛层设置乃至坛层高度上都颇有讲究，符合中国古代以乾指天、三九阳数的古制。

元郊坛为三层圆形石台，表面饰以琉璃。届祭时，设昊天上帝和皇地祇位于一层坛上，二层、三层则设从祀神位。到至大三年（1310年）冬至祭天时，因从祀神位太多，三层郊坛容纳不下，以青绳代一层，形成四层祭坛。所用青绳长二十五尺，共二百条。以绳索结构坛层，这是古代天坛建筑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对元代郊坛又有进一步的描述，说：

燎坛在外坛内丙之位，高一丈二尺，四方各一丈，周围亦护以墼，东西南三出陛，开上南出户，上方六尺，深可容柴。香殿三间在外坛南门之外少西，南向；饌幕殿五间，在外坛南门之外少东，南向；省饌殿一间，在外坛东门之外少北，南向；外坛之东南为别院，内神厨三间，南向；祠祭局三间，北向；酒库三间，西向。献官斋房二十间，在神厨南垣之外，西向。外坛南门之外为中神门五间，诸执事斋房六十间以翼之，皆北向。两翼端皆有垣，以抵东西周垣，各为门以便出入。齐班厅五间，在献官斋房之前，西向。仪鸾局三间、法物库三间、都监库五间，在外垣内之西北隅，皆西向。雅乐库十间，在外垣西门之内少南，东向。演乐堂七间，左外垣内之西南隅，东向。献官厨三间，在外垣内之东南隅，西向。涤养牺牲所在外垣南门之外少东，西向。内牺牲房三间，南向。

元大都天坛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应该指出的是，元代实行天、地合祀制度。大德年间（1297—1307年）曾有谋臣提出天、地分祀制度，奏请于大都北十四里建方丘，以祭祀皇地祇。但因种种原因，工程方举又停，最终未能建成。

终元一代，郊坛、太庙与社稷为三大祭祀重典。除此之外，大都东郊还辟地建有藉田，内设先农、先蚕两坛。元代